

武汉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胡德坤

[摘要]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时期的最后一战。日本发动的武汉会战包括政略攻势和军事作战两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坚决抗日,日本的政略攻势并未奏效。在军事方面,日本虽然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但却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反,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陷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关键词] 武汉会战;日本;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 K313.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2-0224-06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作战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以期在短期内一举灭亡中国,结束战争,再准备北进、南进战略,夺取亚太地区霸权。按照日本当局的预测,日本发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后,中国就会屈服,就会出现结束战争的机会。但同日本的预测相反,中国并未屈服,仍在继续进行抵抗。为达到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日本立即策动新一轮攻势,发动以武汉会战为主体的一系列作战,并辅之以政略、谋略攻势,企图制造新的结束战争的机会,避免陷入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潭。日本发动武汉会战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一是政略攻势,二是军事作战。

—

武汉会战的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即日本利用攻占南京的军事胜利对华发动强大的政略、谋略攻势,以期迫降中国政府,并同时进行武汉会战的军事准备。

攻占武汉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自“七·七事变”始,日本接连发动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以制造迫降中国、结束中日战争的机会。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无屈服的迹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将对华政略攻势提上了日程。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进攻南京,是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但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因此,日本决心通过对亲日政权的提携、对抗日政权彻底惩罚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日华关系问题。由此,应彻底认识到,真正的对华长期政策自今日始。”^[1](第468页)日本政府的声明很明显是借南京作战的军事胜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反省”,诱导其走向对日屈服之路。为此,日本当局将对华交涉提上日程。又由于日本攻占了南京,因而对中国交涉的要价更高了。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日华交涉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中,提出了新的对华谈判条件,其基本条件是:(1)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2)在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设立特殊机构;(3)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合作协定;(4)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其具体条件是:

(1)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2)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3)在华北及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4)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5)在内蒙古设置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6)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的实施予以协助;(7)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9)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9)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日本要求中方在年内答复^[2](第380-381页)。日方提出的这些条件,其实质,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变中国为其独霸的殖民地。26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中国政府后,27日便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

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指出,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帝国政府切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若南京政府有所反省,而当与之共谋收拾时局,但南京政府仍标榜长期抵抗,毫无反省之意。”“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做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2](第381页)这一文件表明,日本当局此时已感到很难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标,因而对华进行政略与战略两手准备:一是以政略手段,通过对华谈判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标;二是谈判不成则准备以战略等手段应对中国的持久战。鉴于中国政府迟迟未于年底前正式回复日本的谈判条件,日本当局恼羞成怒。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明确指出,“如现中国中央政府能断然悔悟过来,诚意求和,”仍可谈判。“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2](第385-386页)这一文件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在政略与战略之间,重心已转向战略的一方。当收到中国政府关于回绝日方谈判条件的正式复文后,1月15日,日本当局迅速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对华交涉。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史称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的最后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因此,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在国际法上只有承认和否认某国某政权,未曾有过不以某国某政权为对手的先例,因此,日本政府的声明引起了种种猜疑。为掩饰其失误,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上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将它彻底抹杀掉”^[2](第386-387页)。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日本攻占南京后制订的新的对华政策,其涵义是:(1)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交涉;(2)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3)在中国另行扶植亲日政权;(4)将采取措施使国民政府崩溃或将其并于新扶植的亲日政权下;(5)将采取措施应对国民政府长期作战。按照这一方针,日本当局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制订新的政略与战略。1938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起草了《昭和13年(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提出其基本方针是:“首先继续指导当前的对华持久战争,同时,断然推行昭和军制建设和整顿、加强国家整体力量,完成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在此期间,继续注意和处理苏联的动向,同时,运用政略与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该计划约用4年时间完成。在政略方面,通过扶植“新政权”,恢复占领区的“治安”,诱导蒋介石政权与“新政权”合流,导致对华战争的结束。外交方面,要加强同轴心国的联系,要同美国保持亲密关系,并避免刺激英国和苏联。在战略方面,对华采取消极持久战,特别是要减少战力的消耗,促进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要达成上述目标,就要建立“昭和军制”,使陆军达到60个正规师团、30个临时师团,空军250个中队。军事方面的人力总动员为600万人,工业交通方面的人力总动员为400万人,战略物资方面总动员指标为:钢材1300吨,煤炭1.1亿万吨,飞机1万架,卡车10万辆^[3](第143-156页)。2月16日,日本大本营

制订《自昭和13(1938)年2月至同年夏,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指导要纲》,要求在华日军“确保在华的现占领区,谋求其安定。同时,为了同苏、中两国作战,要完成我军的实质性准备。”^[1](第486页)2月18日,日本取消华中方面军,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畑俊六任司令官,准备武汉会战。

第二,消化与巩固已占领地区,建立对华作战的基地。其重点是扶植和建立各级傀儡政权,通过傀儡政权控制和统治占领区。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已攻占我国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大片领土,以少兵临大国的日本,在未消化和巩固占领区前,是不敢冒险继续推进的。为此,日本每占领一地,就迅速寻找亲日分子,拼凑傀儡政权。日本关东军占领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等地后,1937年9—10月,先后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在此基础上,又于11月22日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第一个较大的伪政权。在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积极扶植华北傀儡政权,得到陆军省同意。日本陆军省进而提出先成立省级政权,然后成立联省政权,待华中联省政权成立后,再成立统一的全国性伪政权。按照这一设想,1937年12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炮制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由大汉奸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华中,日本华中方面军先后建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杭州治安维持会”等地方伪政权。1938年2月12日,日本陆军省制订了《华中政务指导要纲》,要求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以达到“维持治安”,“确立日华提携共荣的基础”,“促进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1](第496页)按照这一方针,日本华中派遣军紧急拼凑华中伪政权,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统辖华中占领区的各地伪政权。至此,日本以日军为后盾,通过伪政权统治华北、华中占领区。

第三,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进一步增强国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第73次议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中国事变已进入新阶段,要达到战争的目的,需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为适应战争的长期化,预算也要尽力保证军需品的充足发展。为准备对华长期战争,议会按照近卫的要求,军费预算在原35亿日元的基础上,增加了49亿日元,增幅达140%,以保证对华长期战争的需要。议会还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国家电力管理法”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法令达86个^[4](第83-91页),加快了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在侵华战争轨道上前进的速度。

总之,武汉会战前,日本当局利用南京会战的军事胜利,向中国政府发动了强大的政略攻势,妄图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方条件而结束战争。当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便将武汉作战提上了日程。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略攻势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迫降中国政府,二是进行武汉会战前的各种备战。在这个意义上说,南京会战后日本对华政略攻势也属于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南京会战后,日本当局在对华发动战略攻势的同时,积极进行武汉会战的军事准备。武汉会战亦分两个阶段:一是武汉外围战,二是武汉作战。

武汉外围战的目标是攻占武汉外围地区,时间始于台儿庄战役。早在1937年12月,按照日本参谋本部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发动山东作战,至1938年1月中旬,相继攻占济南、青岛等地,控制了山东省大部分地区,企图打通津浦线,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为阻止山东日军沿津浦线南进,1938年2月,蒋介石命令驻守徐州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在津浦线北段发动攻势,收复济宁等地。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也进行反攻,于是中日军队在津浦线山东段展开激烈的争夺战。3月13日,日军第二军命令第十师团南下占领运河以北地区,第五师团从临沂进攻峄县,配合第十师团作战。为阻止日军南下,中国第五战区派出重兵阻击日军。3月12日,中国军队在临沂同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1个多旅团兵力)进行激战,直到月底,坂本支队仍未能走出临沂,导致第十师团濑谷支队(1个多旅团兵力)孤军深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相继攻占滕县、临城、韩庄、峄县等地,逼近台儿庄。台儿庄属山东峄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徐州北面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3月22日,日军濑谷支队先遣队向台儿庄发动进攻,被中国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击退。日军恼羞成怒,接连发动猛

攻,多次进入市区,又被中国军队逐出。日军坂本支队奉命增援,在台儿庄东部遭到中国军队围攻,被迫突围。4月4日至6日,濑谷支队也遭到中国军队包围,被迫突围。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到惨败。是役,日军死伤达11984人^[5](第41页)。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的受挫,使日本大本营发现徐州地区中国军队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对华北、华中日军都有威胁,若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就必须进行徐州会战,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徐州为苏北重镇,位于津浦线与陇海线交汇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南京失陷后,徐州便成为阻隔南北日军会师、牵制日军向武汉进攻的战略地带。台儿庄战役取胜后,蒋介石进一步充实第五战区兵力,准备在津浦线同日军作战。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84号》,下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协同作战,南北夹击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大陆指第106号》指令,所附《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指出,华北方面军以约4个师团的兵力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为此,以主力攻击徐州附近之敌,以约1个师团攻击兰封—绥德—一线敌军的退路;华中派遣军以约2个师团兵力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攻击津浦沿线地区,努力切断敌军退路。作战时间预定于4月下旬^[6](第245-246页)。

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分别制订了徐州作战计划。5月上旬,日军发动徐州作战,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却无险可守。中国守军在徐州外围战中进行了顽强阻击,但未能阻止日军合击,5月中旬,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此时,中国军事当局及时决定第五战区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第五战区将40万大军化整为零,分别突围,至21日,顺利撤至豫南和皖北。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沿陇海线两侧乘胜向西追击,进入皖北和豫西。6月上旬,日军进至开封,逼近郑州。如果郑州失陷,日军将沿平汉线长驱进击武汉。为阻止日军南下,中国当局下令引黄河之水阻止日军。6月9日,中国军队在新郑北面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滔滔黄河水奔泻而出,淹没豫、皖、苏三省大片地区,以沉重的代价迫使日军退却。

徐州作战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其消灭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主力的目标未能实现,日军承认“战果之微,出乎意料”^[7](第542页)。然而,日本通过徐州作战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联成了一片,为进攻武汉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实际上,日本大本营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武汉、广东会战,在进行徐州作战时就考虑到进行武汉会战,并将广州作战(主要是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一并进行。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这是陆军的一致看法。陆军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攻占武汉、广东,就能统治中国。如果这次作战胜利,可以说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就能实现一大半。海军也认为,控制了中原,就能实质性地统治中国。由于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迁往重庆,为了轰炸重庆,必须占领武汉地区。如果进行武汉、广东作战需投入陆军主力,以现有兵力作战是可能的。日本大本营预计苏联不会参战,但对武汉、广东作战再加上政略、谋略的作用,能否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没有把握。^[7](第546页)由此观之,进行武汉、广东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但大本营对此缺乏自信。尽管如此,大本营无计可施,也只有走这一着棋了。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武汉作战。根据御前会议决定,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订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要求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以此为前提,使对内对外政策一切适应于此^[2](第389-390页)。

日本进行武汉会战最重要的准备是军事准备。早在1925年日本就制订出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在制订武汉作战计划时,也是在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即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华中日军沿长江西进,两路夹攻武汉。此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区“治安不良”,日本华北方面军“因治安肃正力不从心”,又因黄河决堤交通不便,只能“以佯动牵制敌军。”^[7](第544页)这一始料不及情况的出现,迫使日本大本营修改武汉作战计划,放弃华北日军南下计划,而由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行武汉作战准备。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在秋季进行武汉、广东作战,“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武汉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的中枢——武汉三镇,和宗

成徐州作战以来就着手建立的黄河至长江间的(对华)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就越高。”为此,进攻武汉时,应对配置在该地的中国军队以“最大的损害”,然后限制战局扩大,在武汉附近配置若干机动兵团,形成持久战的态势。^[6](第269页)为进攻武汉,日本投入了重兵。当时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华中派遣军就达14个师团,占其兵力的41%,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达9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26.5%,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是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日军分两路进攻武汉,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鄂北、豫南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担任配合作战;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5个师团在江西庐山集结,沿长江和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担任主攻作战。8月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188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同海军相配合,攻占武汉附近要地”,“华北方面军努力牵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6](第271页)日军第二、第十一军分两路同时向武汉推进。

武汉地处中原,为纵贯南北的平汉线、粤汉线和横穿东西的长江的连接点,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京会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便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为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武汉会战,决定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大别山地区,陈诚第九战区驻守庐山地区,利用险峻山地阻击日军。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最初为30个师,后逐步增加到129个师,约110万人,是全面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8月27日,日军第二军分南北两路发动进攻:北路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切断平汉线;南路沿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两路日军均遭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如信阳作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第十师团,日军第三十九联队从出发时的2800人减少到不足800人。^[5](第147页)在大别山作战中,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苦战1个多月,死伤4400多人。^[5](第151页)10月16日,日军攻占信阳,后沿平汉线南下时在桐柏山又遭中国军队阻击,直到26日武汉沦陷后才进入湖北。进攻大别山的日军直到25日才突破大别山防线。

8月30日,日军第十一军兵分三路从江西九江向武汉推进:北路沿长江北岸,中路沿长江南岸,同时向武汉推进;南路通过庐山,沿德安、永修一线推进,攻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同样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在庐山,从8月至11月,中日两军打得难解难分。9月25日,日军第一零六师团在庐山马回岭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续出。10月8日,师团司令部向军司令部紧急报告:“师团正面之敌,一到夜晚依然向师团四周进行数次反击,师团逐渐处于被包围状况。”^[5](第174页)日军派出多支援兵,直到10月17日才突破重围。9月26日,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在庐山南麓向德安推进时,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甚多,连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身负重伤。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等援军投入作战后,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于10月27日攻陷德安。长江沿岸作战中,在湖北田家镇,日军今村支队遭到中国军队夹击,死伤1150人。^[5](第158页)。田家镇失陷后,武汉已无险可守,日军长驱直入,第六师团沿长江北岸推进,于10月24日攻占武汉西北郊的黄陂。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武汉东郊的葛店。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咸宁,切断粤汉线,逼近武汉南郊。至此,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由于武汉无险可守,中国军事当局已令守军撤出,武汉实际上是一座空城。26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汉口,日军波田支队进入武昌。27日,另一支日军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陷落,历时3个月的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日军虽取得了会战胜利,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死伤达35500人。^[8](第295页)同时,日本既未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使中国政府屈服,更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远未达到其战略目标。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也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完成与终结。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深陷入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参 考 文 献]

-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8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 东京: 朝云新闻社 1975 年版。
- [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 东京: 原书房 1978 年版。
- [3] [日] 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东京: 时事通讯社 1962 年版。
- [4] [日]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 3: 日中战争 2》, 东京: 青木书店 1972 年版。
- [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8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 东京: 朝云新闻社 1976 年版。
- [6] [日] 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 9: 日中战争 2》, 东京: 美铃书房 1978 年版。
- [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8. 大本营陆军部 1》, 东京: 朝云新闻社 1974 年版。
- [8] [日]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东京: 原书房 1979 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

Study on Japan's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Wuhan Campaign

Hu Deku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Wuhan campaign was the final battle in the period of Japan's strategic attack to China. The Wuhan campaign launched by Japan consisted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ffensive. China government's uncompromisingly resistance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Japan's political attack. Militarily, although Japan won the Wuhan campaign, it couldn't annihilate the main force of China army and obtain the chance of ending the war. Conversely, the Wuhan campaign 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itzkrie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Wuhan campaign, Japan's aggression to China changed from strategic attack to strategic stalemate and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lso changed from strategic defence to strategic stalemate.

Key words: period of Wuhan campaign; Japan; Japan's China policy